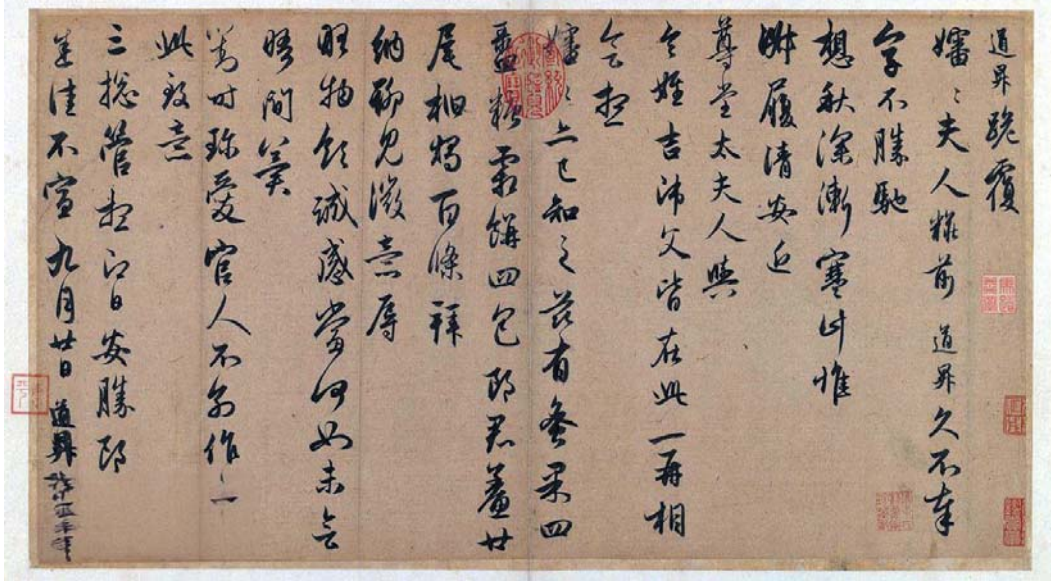


最近，一部拥有“神级口碑”的电影《给阿嬷的情书》让无数人落泪。故事并不复杂：上世纪四十年代，潮汕青年郑木生下南洋，留下妻子叶淑柔和三个孩子在老家。维系两人的唯一纽带，是一种叫“侨批”的东西，早年海外华侨寄回国内的汇款凭证，往往连带一封家书，批一封，银几许，既是钱，也是信。阿嬷守着老屋和一沓侨批，等了一辈子。多年后，孙子欠债，偷看侨批后怀疑阿公在泰国成了富豪，便偷渡去寻亲。可他找到的，却是一位叫谢南枝的老妇人。真相揭开：阿公早在1960年客死异乡。南枝受过阿公帮助，不忍阿嬷崩溃，藏起讣告，冒充阿公继续写侨批、寄钱，一骗十八年。后来南枝寄长信坦白，却因台风只寄到一张合影，阿嬷误以为丈夫再婚，心碎断联。直到孙子带回真相，八十八岁的阿嬷远赴泰国，与已患阿尔茨海默病的南枝相见。没有抱头痛哭，只有平淡的问候与赠礼。两位女性用一生诠释：做人，得有情有义。

看罢电影，不免追问：一封信，究竟能承载多重的分量？从古至今，中国人为何把家书看得比命还重？不妨借这封“骗了十八年”的侨批，翻开千年底层，一探书信里的中国。



管道昇《深秋帖》，现藏故宫博物院。



广东省档案馆馆藏侨批里的信函。

家书仅一纸 何以抵万金

从热映电影《给阿嬷的情书》看“书信里的中国”

□孙晓明

父亲的苦心 司马光的“硬核” 与朱熹的“唠叨”

哪个父亲不操心？司马光操心起来，非同一般。他的儿子司马康中了进士，眼看就要踏入官场。换作一般家长，早就大宴宾客了。可司马光忧心忡忡——他看见整个大宋朝都在“以阔为美”，请客要摆满一屋子山珍海味，连农夫都穿上了丝鞋。他怕儿子被奢靡之风裹挟，于是提笔写下了一封著名的家训，也就是后来收录在《资治通鉴》之外的《训俭示康》。

一开头，他就亮明自己的立场：“吾本寒家，世以清白相承。吾性不喜华靡，自为乳儿，长者加以金银华美之服，辄羞赧弃去之。”他说自己出身清寒人家，从小就不喜欢奢华，长辈给他穿镶金戴银的华服，他觉得丢人，偷偷脱掉。这位当朝大官不说教，先拿自己“开刀”——你爹我从小就这样，不是装，是真觉得穿金戴银丢人。

接着他又搬出孔子的原话：“与其不逊也，宁固。”与其骄奢无礼，倒不如固执简陋。他又说“以约失之者鲜矣”，因为俭约而犯错误的人很少。他还举了当朝几位贤臣的例子：李沆做宰相，家里厅堂窄得只能转开一匹马。鲁宗道做谏官，家里穷得请不起客，只能在酒馆招待朋友。张文节做宰相，生活水平还跟当小官时一样。有人劝他稍微随大流，免得被人说虚伪。张文节气呼呼说了一番大道理：“顾人之常情，由俭入奢易，由奢入俭难。吾今日之俸岂能常有，身岂能常存？”按照人之常情，从俭朴变成奢侈很容易，从奢侈再回到俭朴就难了。我今天的俸禄难道能一直这么高吗？我的身体难道能永远活着吗？一旦哪天不一样了，家里人已经习惯了奢靡，没法立刻节省，那就无家可归了。司马光把这话写在信里，就是想让孩子明白：俭朴不是抠门，是给自己留后路。

最后他甩出了那句掷地有声的话：“俭，德之共也；侈，恶之大也。”——俭朴是所有美德的共同特征，奢侈是所有恶行中最大的。怕儿子不懂，他还解释：俭则寡欲，寡欲就不被外物奴役，做官就能走正道；侈则多欲，多欲就会贪慕富贵，最终招来灾祸。他甚至拿寇准的后代举例：寇准当年奢靡得出了名，虽然因为功劳大没人敢说什么，但他的子孙沾染了这种风

气，如今大多穷困潦倒。这哪是家训，分明是一剂清醒药。后来司马康果然不负父望，一生廉洁，“口不言财”。父亲的唠叨，有时真能救人一命。

另一位父亲朱熹，就“唠叨”得更接地气了。他的长子朱塾，二十岁了还学无所成，懒惰成性。朱熹恨铁不成钢，干脆把儿子送到好友吕祖谦那里去读书。临行前他写下一封《与长子受之》，事无巨细到令人发笑：不许随便外出，不许饮酒荒废学业，不许议论别人的过错和家家长里短。连怎么交朋友都要手把手教：“大凡敦厚忠信，能攻吾过者，益友也；其谄媚轻薄，傲慢褻狎，导人为恶者，损友也。”——敦厚忠诚，能指出我过错的，是益友；谄媚轻浮，引诱我做坏事的，是损友。最后那句最戳心：你要是到了那地能发奋改掉毛病，我还有指望；否则，你拿什么脸回来见父母？一个父亲的无奈、期望、不舍、焦虑，全在这几句话里。古今父亲的心，原来是一样的。

帝王的“肉麻” 李世民对儿子说 “想你想得要死”

谁说帝王家无情？唐太宗李世民第一个不答应。公元645年，他亲征高句丽，太子李治留守定州监国。父子分离，这位杀伐决断的皇帝想儿子想得不行。偏偏有几次宫中的信都到了，却独独没有李治的亲笔。这下李世民急坏了，提笔就写了一封短得不能再短的信，后世称之为《两度帖》。信里他写道：“两度得大内书，不见奴表，耶耶忌欲恒死！少时间忽得奴手书……欲似死而更生！”——宫里来了两封信，都没见你的表章，阿耶我想你想得要死！刚才忽然收到你的亲笔信……简直像死而复生！

值得注意的是，他自称“耶耶”，那是唐代父亲对儿子的昵称，相当于今天北方方言里的“老爹”。而“忌欲恒死”，就是“想死我了”。一个皇帝，用这么直白、甚至有点“没出息”的话跟儿子撒娇，恐怕世间罕见。他还特别交代：“今日以后，但头风发，信便即报。耶耶若少有疾患，即一具报。”——从今以后，你头风病一犯就立刻报信。老爹我要是有点小病，也会全部告诉你。这才是真父子。没有圣旨的威严，没有君臣的距离，只有两个相互牵挂的人。

宋代大文人苏轼后来读到这封信，忍不住感叹：李世民这么暴躁的人，居然对儿子说出“想你想得要死”这种话，除了爱，还能是什么？帝王也是人，下了朝堂，他只是

个想儿子的老爹。

游子的碎碎念 一个宋代小女儿 与流放海南的老翁

如果说帝王的信是“肉麻”，那普通人的家书，就是“戳心”。1900年，敦煌藏经洞被打开，学者许承尧在一卷佛经的背面发现了一封千年之前的家书。写信人自称“二娘子”，是一位不知名的宋代女子，随丈夫从西北一路到了东京，也就是今天的开封。她思念远在西北的母亲，提笔写道：“一离日久，思恋尤深。奈烟水以阻隔……伏惟尊体起居万福。”离开太久了，太想您了。奈何山高水远……只愿您身体安康。她给母亲寄了白綾半匹，给姐姐寄了红锦和裹肚，还惦记着小外甥：“未厮，寰珠这两个小外甥，最近开心吗？给他们寄了两角红锦和一个小镜子。”她怕母亲嫌东西少，还撒娇说：“本想多寄点，又怕送不到，您可别怪我寄得少。”千年之后读这封信，依然能看见一个娇憨的小女儿，笑着、嗔着、思念着。家书是什么？就是“我在这里一切都好，就是想您”，就是明明寄了东西还要说“别嫌少”。

另一位被流放海南的老翁，就更让人心酸了。他是苏轼，六十二岁被贬到儋州——今天的海南岛，在当时是九死一生的“鬼门关”。他在那里吃芋头、住椰子树下搭的小屋，还自嘲“我本海南民，寄生西蜀州”。但他最放心不下的，还是远方的亲人。在给侄孙苏元老的书信中，他写道：“老人住海南如昨，但近来多病瘦瘠，不复如往日，不知余年复得相见否？”我这个老人住在海南还是老样子，只是近来多病瘦弱，不知道这辈子还能不能再见到你？读到这里，谁不心酸？但他随即又安慰侄孙：“然胸中亦超然自得，不改其度。”我心中依然超脱自得，没变。他还记得答应过给侄孙的父亲写墓志铭：“只要数年不死便作，不食言也。”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，自己都快活不下去了，还在惦记着对侄孙的承诺。最后他不忘嘱咐：“因为你是我的亲人，一定会被人们关注。你在京城居住，凡事一定要多加小心。”这是怕自己的政治罪名连累侄孙。这样的家书，岂止是信？是一颗滚烫的心。

家人的牵挂 管道昇的蜜果鱼干 与梁启超的惊魂一日

管道昇，元代才女，大书法家赵孟頫的

妻子。她写给婶婶的一封家书叫《秋深帖》，据说可能是赵孟頫代笔，因为末尾有涂改痕迹，疑似把“子昂”改成了“道昇”。但不论谁写的，那份温情是真实的。她在信里写道：“秋深渐寒，计惟淑履请安……兹有蜜果四盈，糖霜饼四包，郎君鲑廿尾，柏烛百条拜纳，聊见微意。”深秋渐冷，给您请安。现送上蜜果四盒、糖霜饼四包、上品鱼干二十条、蜡烛一百根，聊表心意。礼物不贵重，都是家常土产，却透着亲人间那种“有什么好东西都想分你一份”的朴素情感。家书里的中国，从来不缺温度。

近代的梁启超，给女儿梁思顺的信，则写出了另一种惊心动魄的父爱。1923年5月7日，梁思成和梁思永出了车祸。梁启超在信的开头就说：“我现出了极高兴地告诉你……你所最爱的两位弟弟，昨日从阎王手里把性命争回。”他详细描述了车祸经过：思成左腿断了，思永嘴唇唇破。最让人心碎的是思成醒过来后说的话：“爹爹啊，你的不孝顺儿子，爹爹妈妈还没有完全把这身体交给我，我便把他毁坏了……姐姐在那里，我怎样能见他？”梁启超写道：“我那时候心真碎了。”但他马上又安慰女儿：“今朝我同你二叔、三姑、七叔去看他们，他们哥儿俩已经说说笑笑，又淘气到了不得了。”更有意思的是，梁启超的妻子要去告肇事司机，甚至要找大总统“闹事”。梁启超说：“汝母必欲见黎元洪，我亦不阻止。”一个父亲的真实：孩子没事了，我可以笑着写信；但伤害孩子的人，绝不放过。

书信里的中国，从未远去

从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70年代，历时100多年的侨批，与司马光的家训、李世民的肉麻家书、二娘子的碎碎念、苏轼的绝笔牵挂、管道昇的蜜果鱼干、梁启超的惊魂家书，本质上并无不同——它们都是一个人坐在灯下，铺开纸，提起笔，一字一句写下“我在这里，你在那里，但我心里有你”时的庄重与深情。

今天，提笔写信的人越来越少了。微信秒回，视频通话，一切都快了。但有些东西，快不来。那是等待一封信时的期盼，拆开信封时的仪式感，触摸纸上字迹时的温度。书信里的中国，从未远去。它只是换了一种方式，继续活在每一句“我想你”里，活在每一个愿意为他人扛起责任的人心里。